

因特虎深圳俱乐部
南方都市报
综合开发研究院泛珠研究中心

联袂推出

因特虎深圳报告 II

深圳选择

突围

金心异 老亨 吕中校 等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因特虎深圳报告 II

深圳选择突围

金心异 老 亨 吴中校 等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选择突围/金心异, 老亨, 吕中校 等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306-02670-4

I. 深... II. ① 金... ② 老... ③ 吕...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
-深圳市-文集
IV.F127.6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367 号

责任编辑 邓启铜

封面设计 王 呈

责任校对 中 原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 510275)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13千字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这是“因特虎三剑客”和他们的朋友研究撰写，组织出版的“民间版深圳蓝皮书”的第二本。

第一本《十字路口的深圳》于2004年底问世时，在这个城市产生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在国内，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可以让任何大胆的创意或天真的想法很容易地付诸实施，他们产生了冲动，提出了一套想法，然后他们就去做了，做出来的东西哪怕是很稚嫩，但是那是创意的结晶，任何人都不可以小视。当然深圳这座城市从来都不会忽视这种年轻的、向上生长的冲动，于是他们收获了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成功，他们引起了重视，他们得到了掌声，他们也看到了更加诱人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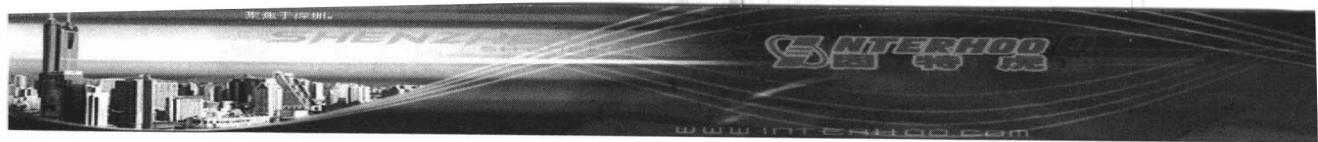
于是他们又拿出了这第二本：《深圳选择突围》。从书名中我们读出了锐气和理想，他们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无限期许。也许这座城市在过去的一年里真的在这样努力，也许这样的断言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成立，也许冲锋号已吹响，但人们还没有真正做好决战的准备，也许深圳早已悄悄出击，只是战况远没有人们想像得那样清晰。但无论如何，深圳是值得期待的。

在他们酝酿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已经从一个网络上的虚拟社会，走到了现实中来，因特虎深圳俱乐部已经成为一个有形的深圳民间思考者组织，无论是小规模“因特虎双周沙龙”，还是因特虎与综合开发研究院、《南方都市报》等共同举办的“深圳圆桌”，以及“深商论坛”，都成为他们发出声音的阵地。他们的思考也越来越系统化、学术化，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因特虎三剑客”以个人方式加盟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泛珠三角研究中心，即是他们学术方向追求的一个证明。作为综合开发研究院这样一个也具有有一定民间性质的国内知名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我欢迎和支持他们的这种转变，并渴望看到他们获得更多更引人注目的成绩。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李罗力

2006. 1. 27



尝试为整个国家探路的一个大动作。

在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更进一步，将李氏主政深圳的政纲一览无遗地展现在社会面前，而这政纲的妙处在于，对深圳来说，它也许可以算是“复古主义”的，或者说叫“保守主义”的。在经过了2002年以来席卷深圳及广东甚至全国舆论的深圳定位问题大讨论之后，深圳发现回归传统才是自己的正确选择。什么传统？改革。李试图重新塑造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锋的形象。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这正是深圳定位问题引起全国关心的原因所在。而2003年达到沸点的深圳定位问题的讨论，其所为深圳开出的药方，大多集中于直辖、深港一体化、回归广东等涉及到行政区划的难点区间，不可由深圳自主实现，李鸿忠向深圳改革传统的回归，跳出旧局自求改变，借力于“保守主义”的选择，事实上可能推动深圳进行一系列相对激进的改良举动，而改良的方向则是：法治政府、问责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企业化政府、有限责任的小政府。

深圳的这一定位有可能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国家发改委将已停开了好些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首度重开放在深圳，饶有深意，而中央决策层锐意推进的所谓“综合改革”，其在全国的试点选择，已在2005年底清晰地指向了上海浦东、深圳市、天津滨海新区三个地点。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所讨论的所谓“抛弃”问题，已不存在，深圳的改革重任，深圳为国家探索出路的历史使命，已然在肩。

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历史镜头就是，2005年9月12~13日，就在深圳特区25周年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又一次来深圳视察，并且主持召开了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事实上是为过去两年多时间的所谓“国务院调研组”的工作，作出一个结论。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温总理代表中央，完全肯定了中共深圳市委的战略方向：改革创新。指路明灯至此已经十分清晰，深圳未来的两大战略任务就是：综合改革、自主创新。

太阳出来，迷雾散去，在《十字路口的深圳》一书中我们所断言的“深圳的迷惘时代”，在此一系列事件的廓清下，已可以肯定地宣告结束，深圳方向已定，庞大的身躯决定选择突围。

这是一次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突围！是深圳特区真正意义上的二次创业。但突围的意义不仅仅是深圳的，而且更重要是全国的。中国如何完成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科学发展观如何落实？靠自主创新，深圳的区域创新体系和

“效益深圳”就是此一重要方向上的实验课题；中国如何完成政治转型、文化转型？综合改革就是此一方向上的实验课题。

2006年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在经过了2005年全年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组织人事准备、改革方案准备之后，真正的动作必须在2006年展开。如果2006年深圳的改革、创新没有全面铺开，我们就将错失这一次绝佳的历史机遇。而历史机遇从来就是稍纵即逝的。

然而深圳向何方？深圳突围的突破口选择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因特虎深圳报告2005”版确定以《深圳选择突围》作为书名的用意所在，这就是我们这本书中着重要讨论的问题。

引子：2006是深圳关键的一年



目 录

第一部分 因特虎三剑客“深圳十大问题”对话集

第一章	从“效益深圳”、“和谐深圳”到“新特区主义”	3
第二章	李氏新政的突破口之一：深圳城市化的标本价值	19
第三章	李氏新政的突破口之二：深圳人口问题：1200万带来的烦恼 ...	35
第四章	李氏新政的突破口之三：如何激活区域创新体系	47
第五章	李氏新政的突破口之四：深圳的文化产业能成为第四支柱产业吗	58
第六章	因特虎关于深圳问题的最新主张之一：“让纳税人走上前台”与 社会自治	69
第七章	因特虎关于深圳问题的最新主张之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深圳 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一要务	87
第八章	因特虎关于深圳问题的最新主张之三：以商业精神革新政府治理	103
第九章	因特虎关于深圳问题的最新主张之四：“新特区主义”不能回避 区域定位问题	116
第十章	当务之急：深圳治安困境如何突破	129

第二部分 2005年深圳语文

第一章	“官方语文”之01号 中共深圳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 ..	147
第二章	“官方语文”之02号 继往开来 改革创新 把深圳经济特区的 宏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52



第三章	“官方语文”之03号 李鸿忠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5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179
第四章	“民间语文”之01号 李哥成为深圳“一哥”之后	189
第五章	“民间语文”之02号 上帝保佑闯深圳的孩子	198
第六章	“民间语文”之03号 明天，我们的主场在哪里	205

第三部分 2005年经典盛放

第一章	《南方都市报》2005年深圳年度人物揭晓	211
第二章	《南方都市报》2005年深圳年度事件揭晓	221
跋	“因特虎”这两年	253
附录	深圳大事记（2004.7—2005.12）	256

深圳
选择
突围



第一部分

**因特虎三剑客
“深圳十大问题”对话集**

第一章

从“效益深圳”、“和谐深圳” 到“新特区主义”

第一部分 因特虎三剑客「深圳十大问题」对话集

纠缠不休的深圳定位问题。

这个城市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似乎不如此，人们就手足无措。

最新的动向是，2005年上半年，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深圳似乎摆开了一场理论盛宴，从“效益深圳”、“和谐深圳”到“新特区主义”，依次出炉。



金心异：先解释一句：“新特区主义”是我造的词，李鸿忠虽然提过“新特区”这个概念，但是他并不敢或不愿用“新特区主义”这个词汇，“多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差不多是这个城市的基调，谈“主义”似乎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我固执地认为，不用“主义”一词，不足以准确地命名在深圳出现的这些新的理论火花，也许称“主义”超前了许多，但是没有更合适的词了。

我在一篇文章里也说明了，想出“新特区主义”这个概念是受李鸿忠2005年3月27日在中共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触动。

还记得此篇讲话一出台时，包括老亨在内，相识的好几个朋友都有兴奋的感觉，直觉地感受到这篇被称作李书记就职演说的讲话里，提出了一些新东西，有可能改变深圳的方向，但是要说新意在哪里，却谁也讲不出。因为那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包括改革、创新、特区，这些词，难道不是一直被我们的任何干部挂在嘴边的吗？无论是中央还是深圳，这20年来，不是年年都在讲改革的吗？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深圳各系统各单位大会小

会在学习李的讲话时，我感觉大部分人都还是稀里糊涂的，只是盲目歌颂“改革、创新”，却不知道李解决了什么问题，李的这一解决方案是怎么来的。因而当类似《深圳特区报》上边各色人等诠释李的“伟大”讲话时，他们某种意义上在解构或颠覆李讲话的原始精神。

我记得我自己最敏感的地方在于，我觉得这是为深圳定位问题做了定调。直到今天来看，我的敏感是对的。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最准确的用词来概括李的这些想法。我当时在因特虎写了一篇《就职演说重举“改革”大旗——李鸿忠能帮深圳找回“特区之魂”吗？》，也只是指出李重举“改革”大旗的意义，将深圳定位重新拉回到“特区”二字上；在四月底五月初，我在为报社筹划打算在深圳“两会”前推出的“深圳专题”时，我的脑海里始终在萦绕的是“深圳新思维”五个字，但这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字眼，并不涉及李的新思维如何定义之事。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名字，就意味着你没有最恰当地理解了这件事。

在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深圳新思维”专题的主打文章时，老亨给我看了李氏拟在“两会”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在该稿的第23页，赫然有这么一句话：“当前，深圳已经进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效益深圳、和谐深圳的新时期，我们要树立和强化‘新特区’的意识，把改革创新旗帜举得更高，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境界”。

“新特区”一词一下子击倒了我：这是精要所在。李到深圳两年之后提出的一套说辞，可以归结为一个概念，那就是“新特区主义”，而李的就职演说，就是“新特区主义”的战斗檄文。

不知道为什么在许宗衡于“两会”上代李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文本里，“新特区”一词不见了，也许李、许最后慎重了一下，还是不提出这个概念为好？但是我操作的《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新思维”专题，虽然标注的出报日期是5月30日，但真正的报纸已于5月27日提前隆重出街，这个词已收不回来了。我赶忙打电话给市政府里面的一位官员朋友，问他这个词有没有问题？他肯定地回答说，“很好，没问题！”

《南方都市报》的朋友苟骅特别地打电话过来，问我为什么在报告中找不到“新特区”一词。看来他也一样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概念。果然，在6月3日的《南方都市报》所推出的《深圳权力榜》专题中，他们就堂而皇之地借用了我的“新特区主义”这个概念。

但官方起初没有正式对这个概念表态拒绝还是接受。倒是官媒，很有意



思的是，6月中旬，《深圳商报》刊发了一篇《深圳“新特区”意识对话录》，刊发了该报评论员邹蓝与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的对话，在对话之前的段落里，该报这样写道：“外地媒体认为，深圳提出了‘新特区主义’；深圳本地则称其为‘新特区意识’。无论是称为‘主义’还是‘意识’，都无碍于这一事实：面临着国内政策环境和国际经济环境在21世纪初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圳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新定位。”

其所谓“外地媒体”，当然应是指《21世纪经济报道》了，但它后面讲“深圳本地”，却没说是本地媒体还是本地官员或政府，但从后来演进的情况来看，显然政府已低调地称之为“新特区意识”了。

不过本人仍固执地认为，“新特区意识”远不像“新特区主义”那样旗帜鲜明，易于为深圳之外的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他们大都依然不知道，深圳已经对自己的定位问题作了终结，一个不再发愁于如何定位的新时代开始了。



吕中校：确实如你所说，深圳人确实不太喜欢谈论“主义”，除了实用主义。这是广东文化对深圳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深圳目前更需要的是解决问题，因为深圳目前面临的问题太多、太严重、也太棘手了。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或者说没有让人看到有解决的迹象之前，奢谈“主义”确实让人产生回避问题的感觉。

虽然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雷厉风行，让许多深圳人重拾信心，但是有许多问题不是雷厉风行就能解决了的。比如后边我们会谈到的社会治安问题，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靠严打、闪击、雷霆行动、阶段性成果解决不了问题。对大多数普通深圳人而言，深圳定位问题、前景不明朗问题可能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心理冲击，但是平安保险女职员被人在闹市区奸杀等一系列凶杀案件，却足以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有想逃离的欲望。

普通深圳市民深陷于这些黑灰的色彩里面，生存竞争的激烈本就让他们安全感严重缺失，又面临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你却在此时大谈什么“新特区主义”，是否有点偏离了社会主流意识？



老亨：深圳的问题成堆，现实民生问题需要解决，深圳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同样需要解决。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在解决社会治安、交通堵塞等问题的同时，探讨深圳改革问题、产业升级问题，并不是什么罪过的事情。



金心异：对一座城市来说，问题和主义同样重要，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方向问题、战略问题、定位问题就比社会治安问题、环保问题、交通问题重要，或者层次就高一些。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就比如社会治安问题，事实上已经严重影响了深圳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在特殊的时间段内，它就会上升成为深圳全局的关键性问题，甚至是战略问题。

但是，现代城市毕竟是一个分工极为细致的社会系统，就好像老话说的那样，不同的人，干不同的事，“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各司其职，共同维持这个城市系统的运转。因此，有人去关心外来工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公平问题，有人去关心滨海医院有可能对红树林产生严重的环境影响问题，有人去研究深圳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适度重型化问题，有人去发动宣传丛飞的事迹，而有人则呆在过街地道里卖唱。谁比谁重要？对你来说无比重要的，对别人可能是小事一桩，这从来不足为奇。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强加给别人，非要让别人也认为你的事情很重要。

当然有人会说啦，社会成员虽各有分工，但对市长来说，却是要对这座城市的任何事情负责，他既要为这个城市的长远发展负责，又要为眼下市民的生活问题负责。那么他就得弄明白，对一市之长来说，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紧急的，哪些事情是紧急而且重要的，哪些事情是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

也有虎友说啦，因特虎关心的事情与市长关心的事情高度重叠。因此，因特虎也应该弄清楚事情的重要紧急与否。

没错，没错啊。有人批评我们不该在此时谈些扯淡的“主义”，那只不过是觉得，“主义”对深圳来说是“重要”的问题，而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等现实问题则是“重要而又紧急”的，因此这些社会问题在排序上优先于“主义”问题罢了。可是那只是这些人的看法，我恰恰认为，“主义”问题相比较于那些问题，同样是“重要而且紧急”的，而且其重要性强过那些问题，紧急性也更加强过那些社会问题。因此，我要大谈特谈一番“主义”问题。但是别忘了，我与那些批评者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他们在认为自己的看法重要之后，就批评我不该去谈主义，而我在谈主义的同时，从来不会认为他们不该去谈这些问题。社会分工不同嘛，你们去谈“问题”好了，而我，至少在这一阶段，却是坚决要谈“主义”的。



而且我欣喜地认为，纠缠了深圳七八年之久的“主义”问题，有在2005年前后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可能性。而且对深圳市的决策层来说，在这样的关键时候，如不能一锤定音，把这个战略问题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了，扫去笼罩在深圳人心头已久的“被抛弃”阴影，而任这乌云不散，让深圳继续迷惘，那就是贻误天机。



吕中校：确实如你所说，深圳已迷惘了七八年之久。我们在《十字路口的深圳》一书里面，已描述了这七八年间，深圳人在定位问题上的上下求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珠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到2000年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示范市”，再到2003年初的“国际化城市”定位，我们争论不休，不知道哪个是正选。

在每一次由市委市政府宣布某一新定位时，他们都坚定地认为那是不二之选，但是在后来被扬弃后就烟消云散，除了史笔之外无人再提起。那么这一次，“新特区”的定位，照例我们会宣称这是“不二之选”，问题在于：真的是吗？



金心异：其实在好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关于定位问题的大讨论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因为讲的不是一回事儿。

因为一个城市的定位，本来就有区域定位、产业定位和在此基础上的综合性政策定位等不同的层面。当我们讲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时，这实际上是在讲上海的产业定位，就好像我们讲深圳是中国的高科技城市一样；而当我们讲广州是华南的中心城市时，我们实际上讲的是广州的区域定位，就好像我们讲深圳是珠三角区域中心城市一样。

就深圳来说，在1997年之前的近20年里，我们从未专注过自己的产业定位和区域定位，为什么？因为深圳的综合性政策定位很清晰：深圳就是经济特区。这一点毫无疑问。而那时深圳并未成为一个健全的经济体，产业上虽也在选择何者为主导，并且是选择贸易、房地产、加工工业还是高科技产业，有可能会影响到深圳特区的成败，但那不是定位问题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在90年代中后期我们会为深圳的区域定位问题苦恼不已？是因为我们原有的特区定位日渐模糊了，因而在广东省的范围内，人家试图为我们确定一个角色。1994年左右给深圳安排的角色是与珠海并列的珠三角副中心，1998年，由于深圳经济的蓬勃发展，修正为与广州并列的珠三角两个中心之一，但在心里面，其实很清晰的是只有珠海被贬，并没有深圳的提升，仍是

只有一个中心，深圳只是变成惟一的副中心罢了。“国际化城市”仍是着眼于区域的定位，那意思是说，你不要在内部争了，你眼睛向外吧，至于向外能干成什么样子，那就看你的命啦，干好干不好，不能怪省里，更不能怪中央，只能怪深圳自己。

“高科技城市”、“区域金融中心”等是着眼于产业定位。至于“国际花园城市”，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城市的定位，那只是女生头发上插的一朵野花而已。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示范市”是一个综合性政策定位。某种意义上它的用意与“新特区”相类似，都是在过去“经济特区”的基础上，想在政治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层面做文章。但是除了它太长、不够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太泛意识形态化。



老亨：要理解你所说的“2005年上半年深圳经历了一场理论盛宴”一说，可能得联系深圳近几年的发展境况来通盘考虑。“效益深圳”和“和谐深圳”提出来时，的确在深圳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月13日，在中共深圳市委三届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李鸿忠提出“从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的历史性跨越，黄丽满提出构建“和谐深圳”之后，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深圳直辖或扩地无望之后，深圳谋求“生产自救”的行为，要立足于这2000平方公里，“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了。我当时的解读是：“大局未变，深圳自求改变”，相关帖子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

深圳问题由来已久。说早一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说近一点，也要从追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停发新股的本世纪初；而标志着深圳问题全盘浮出水面的是我为伊狂的《抛》文所引发的社会关注以及半年之后的中央调研组访深圳。光阴荏苒，《抛》论至今，尔来已跨三个年度；中央调研组来深圳，也已然一年有半矣。然而深圳问题依然故我，人们看不到解决深圳问题的清晰指引，甚至连基本的方向也无从分辨。N年了，深圳就这样在混沌中靠惯性和本能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没有过河的石头可摸，甚至不知道哪里是河的对岸。

人们曾经对中央调研组寄予厚望：要么将深圳继续定位为特区，继续给深圳派改革试验任务，勿使特区徒有其名，遭人诟病；要么将深圳定位为直辖市，解决深圳发展的空间、规模和行政架构问题，让深圳放开身手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与国内其他大城市比翼齐飞。

然而，北雁南飞空盼望，春去秋来成蹉跎。在中国战略的大格局中，对